

“湖北简称鄂，还是楚？”“秦汉之间是否有楚朝？”日前，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系列新闻发布会上，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透露，将组织对上述课题的研究。(10月9日《长江日报》)

荆楚文化研究会研究这样两个题目,并且煞有介事地举行新闻发布会,让我怀疑这个所谓的“文化研究会”根本就没有文化,纯粹是吃饱了撑的。因为研究这样两个题目就像研究“1+1”究竟等于“2”还是等于“3”一样可笑。

想改名的还不仅是湖北，这些年，一些地方政府掀起了改名热。部分地方政府甚至为抢占地名而激烈竞争。湖南新晃、贵州赫章县和水城三地为“夜郎”一名争得不可开交，原因大概由于成语“夜郎自大”家喻户晓，三地都想借助夜郎的名声。

动辄改名甚至改名成癖,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病态,其所反映的问题一是急功近利,无非是想通过改名来吸引投资,吸引游客;再一个是缺乏文化自信,自惭形秽。(常梦飞)

重庆市工商局通报,针对沃尔玛在渝企业以普通猪肉冒充绿色猪肉,以虚假的商品说明欺诈消费者等违法行为,从10月9日起,沃尔玛在渝涉案门店除被没收违法所得外,并将处以约269万元罚款,10家分店也全部实施停业15天整顿。(10月10日《京华时报》)

洋品牌不仅有着强大的品牌影响力,也有着巨大的资本影响力。媒体上这些品牌的身影无处不在,加上洋品牌与地方政府间千丝万缕的联系,敢对洋品牌的违法问题施以重拳,在全国各地也颇为少见。沃尔玛在重庆开有10家分店,不仅关系民众生活,恐怕也是当地的纳税大户。从这个角度看,重庆此次叫板国际零售巨头,无疑有着非凡的勇气。

这样的勇气,值得其他各地学习。特别是在招商引资仍是官场主流的背景下,如何管住国际商业巨头,保证商品质量对民众负责,这是各地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。(刘义昆)

■本版投稿邮箱:
zhangjinling@qlwb.com.cn

□本报评论员 高扩

自称曾在深圳GUCCI旗舰店工作过的员工近日在网络上发表了一封《集体辞职的吉驰员工致公司最高管理层的一封信》,控诉古驰公司100多项行为规定中限制员工:喝水要申请,上厕所要报告,孕妇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等,甚至怀孕7个月员工仍要上夜班,最终致使孕妇流产。(新华社10月10日报道)

GUCCI作为国际知名的奢侈品牌,一向给人优雅高贵的感觉,如今却被爆出如此拙劣之事,实在让人目瞪口呆。员工喝水、上厕所

都要经过请示方可进行,甚至孕妇都不能得到合理对待,这些举报如果属实,足以证明人的基本权利在此已经遭到侵犯。

在中国, GUCCI的行为应该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。中国现在算得上是“世界工厂”,也是很多跨国公司实施低成本战略的基地。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,吸引外资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工作要务。在一些地方,政绩已经与引资挂钩,外资企业通常受到政府部门的呵护,而一些企业员工劳动权利的保障却普遍存在着监管缺位。

在一个备受优待而又

缺乏监管的环境中,一些所谓的国际知名品牌在市场上是“金玉其外”,而在内部员工的福利待遇上却是“败絮其中”,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工厂甚至有“血汗工厂”的嫌疑。今年8月,知名服装品牌ZARA被曝光其30多家外包工厂的工人从事着奴隶般的工作,工人在肮脏的厂房中一天工作14个小时,一周工作7天。今年7月,运动品牌厂商NIKE旗下Converse在印尼的工厂被投诉有虐待员工的情况,一家工厂雇用了1万多名工人,这些工人每天人均只能拿到50美分的工资,还经常被主管暴力惩罚,并且可以

被解雇,还难以请到病假。

这些国际性品牌都是跨国经营,总部大多在西方发达国家,产品大多也只在发达国家设计,而具体的生产业务则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工厂。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较廉价,劳动权利监管不甚严格,企业生产成本大大降低。而这些工厂一旦出了问题,品牌企业又很容易钻法律的空子,逃避自身的责任。

与实力雄厚的资方相比,受雇用的普通员工则显得势单力薄,面对资方的侵权行为而无力抗争。此外,地方政府顾及到企业发展的环境,不敢给品牌企业施

加太大的压力。这些因素使得“血汗工厂”违法的成本很低,就算一两例不法事件被揭露,也很容易摆平。在巨额利润面前,又会很快恢复“冷血”的嘴脸。

指望虐待员工的企业造福社会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现在是该根除“血汗工厂”的时候了，这个改变对中国来说其实也是一个促进转型的机会。我们的劳动者不应该仅仅依靠网络论坛和微博来伸张他们的权利，他们的权益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维护，至少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应该有个地方去说理。让劳动者有尊严，我们的社会才能和谐发展。

□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

7日凌晨,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17岁少年符国俊在一家KTV附近吃夜宵时,突遭30余名保安持械暴打,经抢救无效死亡。死者家属称,打人者自认“打错了”。

根据警方的调查,事情的起因源于两名在KTV值班的保安与客人发生了冲突后,向公司求援。于是这30余名保安手执棍棒赶到现场寻找肇事者,结果误伤了符国俊。但对于涉案保安

的具体归属,多方均没有做出明确说明。

虽然警方对此语焉不详,但从此事中仍旧约略看出一些端倪,即这批保安身份可疑,法制意识淡薄,且手段残忍。由这样的群体来维持治安、保护秩序,无异于与虎谋皮。

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结果?难道保安公司招来的这些人,无一例外都是穷凶极恶之徒吗?答案或许没那么简单。

近年来高速发展的经济,带动了中国保安服务行

业的持续壮大。目前,保安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警力,成为维持公共安全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在参与治安巡逻防范、处置群体性事件、企事业单位内部保卫等方面承担了大量任务。

在这个庞大的保安群体中,大部分人来自于农村,属于农民工中的一员。在没有进入保安行业之前,他们只是淳朴老实的青年,或许一生都不会与命案发生关联。

但保安这个行业,始终有与生俱来的尴尬。一方面

保安需要对公共安全负责,带有服务公众的社会属性;一方面保安又受雇于人,拿人钱财与人消灾,必须保证东家的利益。在公私之间游移不定,也就造成了这个行业的两面性——既有吃苦耐劳、热心服务的一面,也存在蛮不讲理、滥用暴力的可能。

尽管现行的保安管理条例中,明确规定保安员不能采用暴力手段解决纠纷,但在实际情况中,保安行业同样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。生存的压力,让保安们往往难以处处依法办事。为

了能够在东家面前“吃得开摆得平”，为了不丢掉来之不易的工作，他们也只能拿起棍棒，参与到施暴者的行列里。

因此,犯错的绝不仅仅是保安本身。如果雇用者能够少贪点便宜,杜绝“黑保安”生存的空间;如果执法者能够多用点工夫,别把什么脏活累活都推给保安去干;如果管理者能够更认真一些,加强对保安人员的法制教育,或许保安业的生存大环境会有相应的改善,类似的悲剧也会更少一些。

去火车站接站，走出火车站出口时，有几个人围了上来，其中一位中年妇女问：住旅馆吧？旅馆干净、安全、价格便宜。而另一位男子则抢着喊：去哪里？出租车价格便宜！我们减少不必要的纠缠，我们一边摆手一边快速地向前行。这几个人见我们

根本没有住旅馆和坐车的意思，便围住另外几位旅客，同样是问人家住不住旅馆，坐不坐车。只见那几位旅客只是向前走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连手也懒得摆一摆。他们离开时，我听到那位中年妇女说：唉，如今“哑巴”越来越多了。

听了那位妇女的话，我不禁感慨：要是我们从事服务行业的人，都能诚实经营，不欺骗、不敲诈顾客，不坑骗外地人，火车站之类的公共

场所也就不会出现“不和陌生人说话”的提示语,更不会出现这么多的“哑巴”了。
(程兆强)

一个同事的孩子过12岁生日时,孩子的姑姑、叔叔等亲戚用数十张100元、50元面额的人民币贴出“生日快乐”四个字,作为送给孩子的生

日礼物,总金额4000多元。

同事在办公室自豪地说这件事时，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些年，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逐步向好，送给孩子的生日礼物也是“水涨船高”，不断推陈出新。但像这样“特殊”的、“金灿灿”的生日礼物还真让人少见。我不知道，当自以为是为的大人们煞费苦心地粘贴一张人民币时，是否想到了孩子是什么感受，是否想到这条“金光

道”会把孩子引领向何处？

孩子过生日送礼物是人
之常情,无可厚非,但不能过
于强化金钱的功能和权重。
笔者以为,孩子过生日时送
些课外读物,或者带孩子参
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,都
是非常有意义的,也是孩子
乐于接受的,何乐而不为呢?

(耿宝文)

■本栏目投稿邮箱：
shifengmeipi@hotmail.com

■本版投稿邮箱:
zhangjinling@qlwb.com.cn

[illegible]